

從泗水到怡保

1930年，我在荷屬泗水出生，那時經濟大蕭條剛擊垮了資本主義世界。我們離中國有千里之遙，中國遭到軍閥割據，現在又面臨新興海權日本帝國入侵的威脅。我的故事真正的起點，是我們一家三口試圖返回故鄉中國，但最後只走到怡保，抵達英屬馬來亞。往後十五年間，還有一次的嘗試以及一次的失敗。1947年，我們一家三口的確抵達了南京，但卻不是就此快樂還鄉。父母八個月後就打消了念頭。再過九個月，在南京陷入共產黨手中以前，我也放棄繼續嘗試，返回我成長的城鎮。

等待前往中國以及重返馬來亞，這兩者形塑了我的人生，影響遠比我意識到的還要深刻。如今老邁的我發覺人生有好多環節都可回溯至這兩地，也看得見年輕時的故事有雙重視角。南京的意象讓我想起人生中似乎幾度追尋的目標，而怡保則代表了我生活其中並學會珍愛的多元文化世界。

多年以後，經過在三大洲間遷徙的日子，我瞭解稱怡保為家鄉不是單純感情用事。我人生最初的十九年裏，大多時光都在怡保的不同

4 家園何處是

地區度過。怡保籠罩在想像中的祖國陰影下，不過在怡保成長讓我對英國保護下的馬來諸州帶有好感，這份好感長存心中。與此類似，雖然我和南京關係並不密切，但南京在我心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記。回想在南京度過的日子時，我發現自己也會想起人生的其他時期，不禁把往日回憶與日後的經歷連繫起來。

父母搬離泗水時，我只要一歲大，因此對泗水毫無印象。一歲那年拍的兩張照片留了下來。其中一張照片裏，我是坐着的小嬰兒，旁邊站着一位高挑的爪哇女子。母親告訴我這位爪哇女子餵我吃東西、幫我洗澡、跟我說馬來語。另一張照片裏的我被抱在園丁懷裏，園丁在父親的學校工作。照片裏的我看起來被照顧得十分周到，身為母親的頭生子和唯一的孩子，深受眷顧。



我和爪哇褸姆。

1929年，父親獲聘成為泗水第一所華文中學的校長。然而時運不濟，大蕭條擴散至爪哇，島上糖業崩盤。由地方華人實業家資助的私立學校頓時陷入財務危機。經過又一年的茫然不定，父親決定請辭。校方無力負擔送我們回中國的旅費，因此父親同意就近找工作，前往馬來亞，學校董事會的一位成員為我們支付到新加坡的旅費。父親在新加坡找到工作，擔任華文學校的副視學官，啟程前往馬來亞霹靂州最大的城鎮——怡保。在父親心目中，這是返回中國之路的中繼站。他恐怕沒有想到馬來亞會成為自己和妻子的長眠之所，而中國則會成為兒子心中悠長的陰影。

多年以後我才瞭解，父親的經歷是當時許多中國人同樣必須面臨的處境。我放下歷史研究，轉而書寫父親這一輩身處的變局以後，更加瞭解二十世紀初的局勢，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又發生怎樣的劇變。我意識到像父親這樣的人提供了起點，讓我由此瞭解過去發生的事，但在試圖理解不同背景的人群時反而也是種阻礙，更何況有些人不是從中國遷居南洋，而是移民到世界其他地方。這讓我想到應該說明移民研究不是我的主要興趣。吸引我投入這個主題的，是中國對外部世界所代表的意義，尤其是對離開中國定居海外的華人而言代表什麼；此外，我也好奇外部世界對中國的認識及想法。這些議題最初皆來自我對怡保和南京的回憶。



近打 (Kinta) 以盛產錫礦聞名，怡保是近打河流域最大的城鎮。除了看起來像個中國城鎮，怡保和我父母拋卻的那個中國毫無關聯。

6 家園何處是

怡保裏華人居民佔多數，他們擁有大部分的店舖，就住在店舖樓上。許多豪宅都是華人礦業家族的宅第。華人主要來自南方的廣東省，說客家話和廣東話，也有來自福建說閩南語的人，包括在英國殖民地檳城出生的本地人。

父母來自更北方的省份，完全聽不懂他們的方言。我們說的中文比較接近國語（官話），是華文學校上課用的語言。學校聘的老師是來自中國沿海更北方地區會說國語的人，因此父親能夠和他負責管理的老師溝通，負責運作學校董事會的幾位實業家則花了一番工夫才總算聽懂父親的話。母親則學了一點廣東話，好讓僕人阿蘭多少能理解她在說什麼。不過母親這裏的華人朋友幾乎都聽不懂母親說廣東話時想表達什麼，母親也從來沒能把廣東話講得標準。

我的廣東話是跟阿蘭學的，這也是我學到的第一堂中國課：中國人有很多種，我和阿蘭就不一樣。這是父母不太招待客人的原因之一，家裏僅有的訪客是屈指可數的幾位學校老師，通常來自怡保外的小鎮，到此尋求父親的建議或幫助。他們大都來自江蘇省或浙江省，講國語時操着南腔北調。我問母親這些人是誰，母親會告訴我有些人和州教育局有磨擦，有些人和學校董事會起了衝突，還有些人則帶着個人問題上門。很多人都住在遙遠的礦業小鎮或橡膠園裏，也是他們任教的小學所在地。然後，母親還會告訴我，我們也一樣離家迢迢，而且跟他們多數人一樣，不會在此久留，等遇到適合的時機就回中國。

母親往往一有機會就告訴我父親對家裏的長遠打算，因此我五歲時就深知這一點，也時時準備回去探望祖父母。母親述說她和父親如

何在泰州成婚，婚後不久就動身前往爪哇，也述說父親在泗水擔任中學校長期間的事蹟。她也告訴我年幼時我體弱多病，患有氣喘，而她自己對懷孕生子又所知甚少，還有生活在異鄉，周遭的人都說着她完全不懂的語言，是多麼孤立無援。

父親送我去上英文小學，我開始上學的時候，中國即將許露頭角，或者說得更精確些，中國剛剛走出陰霾。我知道中國是我們的家鄉：父母總是掛在嘴邊的話題是中國的家人，以及該怎麼努力讓近親生活得好些。他們婚後從來沒有回過家，祖父母還沒有見過我。因此，我自然而然認為返鄉路的綠燈遲早會亮起。父母告訴我是時候回家時，我一點也不意外。然而意料之外的是，我們不是真的要回鄉定居，只是停留數週，造訪老家。當時是1936年中。母親向我解釋，現在父親能告假回家，決定利用假期看看家人，但我們不打算回去長住，因為中日之間戰爭一觸即發，祖父母要父親留在怡保繼續這份好差事，如此一來戰爭開打之後，他還能持續寄錢回家。我將此舉視為孝行的典範，我也已經知道這是所有中國人最重視的價值觀。

母親在我年僅三歲時就開始教我認簡單的漢字，為有朝一日返家做好準備。我不記得那時到底學了什麼。她買了一套字卡，用來教中文讀寫。母親說短短幾天我就能記住幾十個漢字，她滿懷驕傲地告訴父親我記得哪些字。一段時間以後，身為現代教育家的父親擔心她揠苗助長，向她解釋孩子如果過早開始學習，只學會背誦個別生字，反而可能有害。母親不甘不願地就此打住，只得知足於知道我的頭腦沒有問題，開心地斷定我天資聰穎。

從中國回來之後，情況完全改變了。父親既然送我去上英文學

校，於是決定親自教我古文。每晚飯後，我們一起坐下來閱讀簡單的文本。父親希望我學會文言文，這種語言不拿來說，除正式文件外鮮少使用。他教我用短句記生字，告訴我怎麼讀，以前的意思是什麼，以之對比現在口語中的意思又是什麼。父親相信只要古文的造詣夠深（包括學會文言文寫作），就自然能夠精通白話文，因此他不願意讓我念華文學校用的標準課本。何世庵（我的朋友何丙郁的父親，何丙郁日後成為中國科學史家）當時開授文言文私塾課程。父親敬佩何世庵等人的努力，但不打算送我去他那裏學習，因為何先生教授經典時用的是廣東話。

父親從傳統的《三字經》和《千字文》教起，不過之後就改用二十世紀初編訂的《新國文》課本。課文都是文言文，講述知名儒家文人的各種故事，像是孔融和司馬光等等。他們少年時的舉止即已堪為標竿，相當於中國版的不說謊的華盛頓，和亞爾弗烈王（King Alfred）與糕餅的故事。精習語言的課程因此和高尚品德的教誨密不可分。我視之為常態，推測中國人、美國人、英國人共享一致的是非觀念。

父母很快明白這樣學中文遠遠不夠。在英文學校，我每週上五天課，每天上課五小時，學習各種科目。經過這樣的學習，我建立的英文字彙足以描述種種觀念和事物，都是中國古文篇章全未觸及的範疇。我也需要現代中文字彙，因此父母決定下午送我去上華文學校。九歲的時候，他們買了腳踏車給我，讓我可以騎車去附近新街場的私立學校上課。我在這裏學會了更多中文字彙，堪比我在英文學校所學。

但我的中文世界只是一方極小的天地。私立學校的其他學生住在鎮上，教室是店舖裏的一個房間，我們有一位老師，大家上課時才

集合，下課就四散。後來我瞭解我們家為何與眾不同：一部分是因為父母完全無意融入當地，同時也因為我們只有採買或看電影時才到鎮上，然而這兩種活動都不頻繁。父母唯一比較親近的朋友是吳家，他們住在鎮上另一邊，就在鐵路旁。吳毓騰先生是父親的直屬上司，住在教育局附近由政府分配的房屋。吳先生和太太都是上海人，除了上海話也講國語。吳太太很喜歡打麻將，每個週末都邀父母過去湊齊一桌四人。

記憶中，拜訪吳家的日子是生活中的歡樂時光。我們剛搬到怡保的時候，吳家有三個孩子。老大迪先比我大幾歲，他做模型飛機的高明技術讓我們幾個孩子都好崇拜。老二迪華則是孩子王，我們不管玩什麼遊戲都由他帶頭。老三是女孩子，叫做迪和，她比我大幾個月，我叫她姐姐。吳家之後又添了三個孩子，我很喜歡被這幾個更小的孩子叫哥哥。身為獨生子，和吳家的孩子成為朋友，幾乎就像擁有自己的兄弟姐妹。1937年，吳先生的妹妹吳君亦（周太太）帶着一男四女五個孩子來到怡保，逃離日本入侵的戰亂。於是現在又多了兩個比我年長的孩子，周紹海和周容與，我很敬重他們，聽他們描述上海這個大城市。奇妙的是，雖然孩子個個都會說國語，但我們之間常用廣東話溝通，從上海初來乍到的五個新成員也被帶着入境隨俗。店家做生意主要說廣東話。出了政府官廳，怡保幾乎沒有人懂英文；當地的集市馬來語 (*pasar/bazaar Malay*) 則是另一種常用語言。

每逢星期天，我們坐黃包車去拜訪吳家，和他們共度。孩子們自己做玩具，也互相教對方在學校學到的遊戲，像是在火柴盒裏鬥蜘蛛

蛛、踢毽子、放風箏等等，包羅萬象。最重要的是，我們發明了可以好好利用吳家大庭園的遊戲，也玩捉迷藏玩得不亦樂乎。

我從固定拜訪吳家的行程中學到意想不到的一課。每次去吳家都會跨過一座小橋，經過優雅的印度教寺廟以及被充作道教寺廟的石灰岩露頭上的洞穴。有時候從廟前經過，會看見洶湧人潮在這間廟或那間廟裏參加祭典。我很好奇置身其中的意義，但父母從未停下腳步加入人群。

這讓我注意到鎮上還有很多別的廟宇，也有幾座教堂和清真寺。我看見有些地方擠滿祈禱的人群，有些地方則香煙繚繞。父母明白告訴我，他們認為舉凡宗教活動都是迷信，必須與之劃清界線。我注意到父母的朋友也不進廟宇、不上教堂，家裏也沒有任何宗教相關的東西，和我們家一樣。我問母親為什麼，母親的回答是她崇敬我們的祖先，也說明她深深尊敬王家長輩的原因，但我們無法從事任何儀式，因為家裏的祠堂和牌位遠在彼方。然而她的說明還是無法幫助我瞭解其他人為什麼這麼公開大方地展露信仰。但這在我心中種下懷疑論的種子，凡是無法明確歸為理性的事物，我對之一律抱持懷疑。

回顧過去，我接受了家族觀念：做中國人就是做深深紮根於中國悠久歷史的儒家君子，這是家族文人背景的核心。雖然這個想法並未阻止王家人欣賞老子、莊子和研讀佛經，但這個精英傳統的首要之務是依循孔子及其弟子所教誨的理想，將年輕男子教育為帝國朝廷的忠僕。與官府及地方社會首腦人物的關聯讓多數王家人有別於常民，後者是他們理應領導、教育，有時也是統治的對象。因此，他們將各種民俗儀式和宗教實踐視為文化特質，應該容忍，但不可信奉。他們對

需要幫助的人萌生關懷之情時，背後的原則要求他們循義而行，也要求某種置身事外的距離。長大之後，我瞭解我們家和怡保其他華人之所以不密切往來，不只是因為我們離城居住，也是傳統中國社會的結構使然。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具有版權的資料